

平台经济下的数字劳动研究： 基于 SLR 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刘 苹 张 一

(四川大学商学院 成都 610064)

【摘 要】数字劳动是伴随平台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劳动形式，为政府、企业、劳动者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本文采用系统性文献回顾法，在界定数字劳动概念的基础上，对中国知网 (CNKI) 和 Web of Science (WOS) 数据库中检索得到的 595 篇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旅游管理、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劳动法学和社会学 8 个研究范畴。进一步，本文在研究范畴的基础上提炼了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研究的内容框架，并结合内容框架系统阐述了数字劳动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关注重点等问题。最后，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对未来数字劳动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研究结果对于厘清现阶段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以及推动我国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平台经济 数字平台 多学科 系统性文献回顾法 数字劳动

中国分类号：F243.1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 (digital economy) 的发展已呈现出“跨界融合、全面渗透”的趋势，依托于各类数字平台的从业人口规模已经突破了 2 亿人次，约占就业人口的 26% (刘苹等，

* 基金项目：四川省软科学项目“数字赋能与服务软能力作用下四川省现代服务业发展路径研究” (2023JDR0151)；四川省十四五规划课题“新时代青年社会心态与社会情绪的识别及影响机制研究” (SC22B131)；国家能源集团科技攻关项目“基于大数据的多模态情绪识别与绩效动态关系研究” (DSJ-KY-2021-009)；国家能源集团科技攻关项目“水电行业典型岗位指标评价模型研究” (DSJ-KJ-2022-018)。

通讯作者：张一，E-mail: 657518287@qq.com。

2023)。在商业实践中,数字技术与劳务众包(crowding sourcing)和按需服务(on-demand service)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实现了深度融合,诞生了一种以算法为底层逻辑,有效连接劳动市场供求双方的数字平台(digital platform)(刘善仕等,2022)。一方面,数字平台凭借海量的数据优势,能够及时掌握和预测劳动市场的变化,通过新增就业机会、调整岗位类型,维持了劳动就业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在算法管理之下,也间接将劳动者置于“情绪剥削”“三重脱嵌”“全景监狱”之中(张成刚和张中然,2022;Wood et al., 2019),导致了“算法霸权”与“数字泰勒主义”等现实性问题(王蔚,2021)。因此,数字平台的出现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劳动过程,成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所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随着数字平台对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由此带来的数字劳动(digital labour)现象也成为政府、企业、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数字劳动是以数字知识和数字设备作为关键生产资料(韩文龙和刘璐,2020),劳动者依赖于平台媒介产出各种形式的商品与服务的过程(孙伟平和尹帮文,2022;吴鼎铭和胡骞,2021)。不同于传统劳动,数字劳动在“算法逻辑”与“人的逻辑”双重效应下更具复杂性(孙萍,2019),其理论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探讨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的新特点;第二层次探讨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形成的机制与内在逻辑;第三层次则研究数字劳动导致的劳动关系变化,如何在发挥平台经济赋能效应之时,撬动广泛的社会群体参与,以达成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目的。考虑到第一层次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学者们发现数字劳动开始表现出“劳动异化”的倾向。因此,在第二层次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重点探讨数字劳动异化对某一数字职业产生的影响及背后机理,成为理论经济学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例如,徐婷婷(2021)从互联网数字劳动价值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劳动异化如何在数字劳工中形成“劳动同意”。韩文龙等(2020)和姚建华等(2019)分别基于数字劳动的四种表现形式与中国语境,发现相较于传统的劳动者而言,数字劳工群体还面临着更为恶劣的系统性风险。在第三层次研究中,劳动关系的变化要求明确界定数字平台、平台从业者与用工企业之间的关系,以落实劳动者权益保障。研究者大多采用演绎推理、案例分析等方法,从数字劳动关系的法律认定(肖竹,2021)、平台技术赋能(范如国,2021)、产业劳动力的转移支付(姬德强,2022;Schwarz, 2017)等角度进行了理论探讨,但仍然缺乏实证研究。

数字劳动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实践已经吸引了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也推动了理论研究的快速演进。从研究的范围来看,数字劳动研究从最初聚焦于经济现象的描述,向上拓展到以研究劳动者权益保障为代表的宏观政策层面,向下延伸至劳动者心理情绪的微观层面(Liu et al., 2022)。从研究维度与视角看,数字劳动具有灵活性与多样性,借助数字平台不仅为生产资料的配给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也为劳动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就业岗位。从研究的对象看,由于平台经济具有自主性、分散性、参与主体多元性等特点,为保障数字技术与劳动者需求的有效衔接,还需要协同考虑多方利益诉求问题(刘苹等,2023)。为此,在数字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整合多学科视角下的研究,有利于为数字劳动研究注入新的思路与方法。

鉴于上述思考,本文拟从多学科视角出发,采用系统性文献回顾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SLR)对数字劳动这一富有时代性和理论创新性的话题展开文献研究。首先,通过梳理数字劳动的相关概念,提炼其核心要素与外在表征;其次,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文献所属学科范畴的基础

上, 提炼了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研究的内容框架, 并从数字劳动研究的主题、研究重点、理论基础等方面进行了科学评述与系统性梳理; 最后, 本文立足于管理学, 阐述了未来具有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方向, 以期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借鉴参考。

2. 研究方法 with 文献检索

2.1 研究方法

系统性文献回顾法 (SLR) 不同于文献计量分析与元分析, 它要求研究者对目标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内容整理、编码和交叉验证, 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指导性。根据 Danese 等 (2018) 的观点, 通过对文献的内容分析, SLR 能够帮助研究者就某一研究领域进行深入挖掘, 推导出该研究领域的知识框架。基于此, 本文采用 SLR 对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的研究内容进行分析 (详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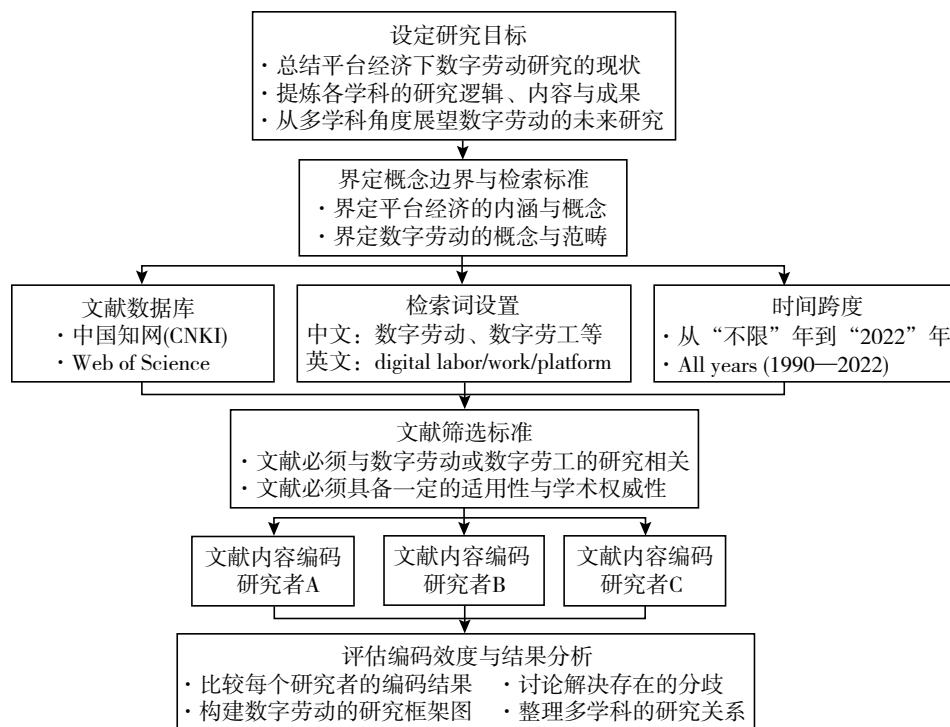


图 1 系统性文献回顾法

2.2 文献检索

在研究文献的获取上, 中、英文文献的获取分别在中国知网 (CNKI) 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对于英文文献, 以 “digital labour” 或 “digital work” 或 “digital platform” 或 “platform

economic”等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考虑到中文文献对 digital labour 一词的翻译存在“数字劳动”与“数字劳工”混用的情况，因此中文检索按“‘数字劳动’或‘数字劳工’并含‘平台经济’”进行检索。

首先，为确保检索结果的科学性，英文文献以 SSCI/SCI JCR Q2 及以上分区作为筛选标准，中文文献以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作为筛选条件；其次，为确保文献检索结果的科学性，人工剔除检索结果中重复出现的文献、广告、书评、综述、会议报告等。共得到 595 篇与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研究相关的文献（中文文献 204 篇，英文文献 391 篇）。

结合发文趋势看（见图 2），学术界关于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研究的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6 年。在国内，《国外社会科学》于 1997 年摘译了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通讯》编辑部发表的一篇短文《走在数字劳工世界的路上》。该文提到，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的扩建已经在 1995 年的德国成为热门话题，认为这种信息交流技术会对劳动条件、劳动关系和劳工市场带来结构性影响。然而，限于信息技术并未广泛渗透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一话题在接下来 10 余年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在 2019 年前后，国内外文献的发表数量才出现爆发性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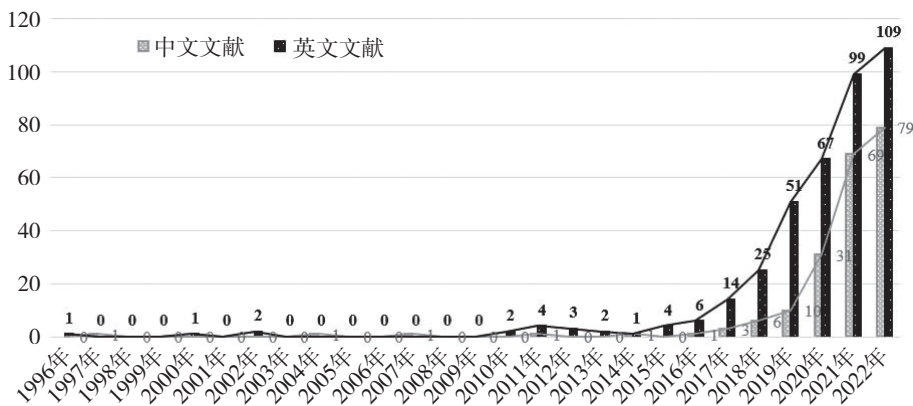


图 2 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研究的文献发表趋势图

3. 数字劳动的概念与特征

3.1 数字劳动的概念：从“盲点之争”到“受众情感”

关于数字劳动的概念问题可上溯至 Smythe（1977）提出的“盲点之争”与“受众商品论”，用来指代用户的注意力与知识性行为被媒介转变为生产力的现象。进入 21 世纪后，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正式提出了“数字劳动”一词。Terranova（2000）指出，数字劳动是互联网中的一种“免费劳动”（free labour）与“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ur），包括网站的浏览与建立、软件包的修改、邮件阅读与撰写等活动。随后，这种互联网中的“免费劳动”被学者们解读为“产销合一者”（presumption）（姚建华和徐偲骅，2019）。通过模糊“休闲”与“工作”的边界，这种新型劳动形

态推动了劳动生产向“社会工厂”的转变 (Fuchs, 2016; 韩文龙等, 2020)。因此, 这种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数字劳动。

伴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的普及, 在 2014 年前后, 国外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开始出现高潮。通过对“劳动”与“工作”的词源分析, Fuchs (2016) 发现数字工作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创造的活动, 是在人脑、语言和数字媒体的帮助下创造新产品的过程, 而数字劳动则是定价化的数字工作, 其核心特征在于劳动异化。在 Fuchs 看来, 数字劳动包含 ICT 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各种形式的劳动, 既包括生产、制造、装配等具备生产性质的各种劳动, 也包括以“休闲”“娱乐”为代表的“产销合一者” (Fuchs, 2016)。Fuchs 的观点也被学术界称为广义的数字劳动。

随着粉丝文化与游戏产业的兴起, 学术界对数字劳动的解读呈现出受众劳动、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三条相互交织的路径 (庄曦等, 2019), 其中由非物质劳动引发的情绪过劳现象成为一个重要话题 (朱悦衡和王凯军, 2021)。从学术研究层面看, 学者们看似在研究“受众”, 实则是研究数字平台、平台企业与受众之间的情绪交互及其劳动异化过程, 表现出强烈的情感批判色彩 (丁依然, 2021)。但是, 以“产销合一者”为代表的无偿劳动是否也应囊括在数字劳动的范畴之中, 一直备受争议。丁依然 (2021) 认为, “剥削机制分析”的随意化和泛化是导致争议的根源, 其根本原因在于杂糅了“劳动” (labour) 与“工作” (work) 的概念。因此, 参考 Fuchs (2016) 的观点, 本文认为数字劳动是指, 数字知识和信息设备作为关键生产资料, 劳动者依托于平台媒介开展的各种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活动, 进而产出各种形式的商品与服务的过程。为论述严谨, 本文将“免费劳动”为代表的“产销合一者”视为一种特殊形式, 若无特殊说明, 本文中的数字劳动一般不包含“产销合一者”。

3.2 数字劳动的特征: 平台参与、劳动异化、在不确定中生产“满足”

作为一种新兴生产力的代表, 数字平台的出现将“劳动者—资本 (企业)—消费者”三元关系重塑为“劳动者—平台企业—数字平台—消费者”四元关系。其中, 平台企业在本文中特指依托于数字平台提供各类生产、生活型服务的企业。一方面, 劳动关系链的重塑提升了劳动价值增值的方式, 但劳动异化仍然存在; 另一方面, 数字平台用工模式的灵活性不仅加剧了劳动过程的不确定性, 还迫使劳动者将情绪劳动嵌入其中 (王蔚, 2021; 罗峰, 2021)。因此, 平台参与、劳动异化、不确定中生产“满足”成为数字劳动的重要特征 (见图 3):

(1) 平台参与。数字平台汇聚了信息、数据、商品等生产要素, 成为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桥梁”, 推动了劳动资源的高效配置。一方面, 数字平台为平台企业搭建了信息平台, 平台企业可以在数字平台上自由发布工作要求等职位信息, 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技能与时间情况, 自由、灵活地选择合适的工作 (刘苹等, 2023)。另一方面, 数字平台通过搭建“虚拟身份”与“排名系统”, 在劳动者中成功营造了“制造同意” (刘战伟等, 2021), 还通过算法管理实现了劳动信息的加密与处理, 通过对劳动过程的“不确定性”暗示, 实现了对劳动者心理层面的控制 (张媛媛, 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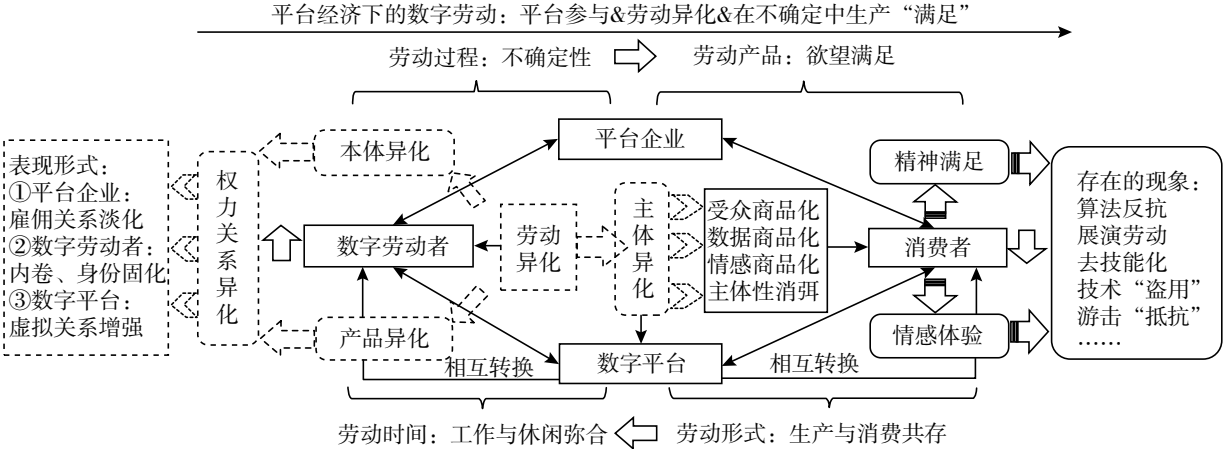


图3 数字劳动的基本要素与核心特征

(2) 劳动异化。在平台参与的情况下，劳动异化成为数字劳动的第二个特征。劳动异化可以理解为产品或利润与劳动者分离，被平台无偿占有并最终转化成与劳动者相抗衡的异己力量（陈红等，2023）。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劳动异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劳动主体异化。主体异化强调作为受众，自己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被售卖给平台，而平台不用支付任何报酬。尤其随着移动网络的生活化与娱乐化，劳动情感被抽象为数字符号（如粉丝数、点赞数、转发数等），表现出受众商品化、数据商品化、情感商品化等问题，劳动者主体地位消弭。二是劳动本体异化。强调数据与算法加剧了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者的行为数据被平台采集和分析后转化为生产资料投入再生产，即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生产的行为数据成为与劳动者相抗衡的力量。三是劳动产品异化。产品异化又称客体异化。一方面，劳动者的个人信息、社会关系、消费习惯等被平台转化为可商品化的资料，成为平台获得广告收益的来源。另一方面，平台通过建立排名系统或营造虚拟身份，诱使劳动者不断进行内容创作与数字生产，劳动产品成为异己的力量。四是权力关系的异化。数字劳动的平台性与虚拟性特征使得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对于平台企业而言，数字技术实现了非接触、弱联系的组织关系，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传统雇佣关系被弱化；对数字平台本身而言，数据带来了劳动者的监督、支配，导致虚拟关系被加强；排名系统固化了劳动者的虚拟身份与等级，加剧了劳动者的过度内卷与去技能化风险（朱悦蘅和王凯军，2021）。

(3) 在不确定中生产“满足”。“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劳动时间、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劳动形式等方面的动态化和不稳定性；“满足”则指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既满足消费者的欲望，还要带给消费者额外的情感体验（王蔚，2021）。首先，消费者希望通过互联网获得精神满足与情感体验，这容易导致消费者主体地位消弭，催生“商品化用户”，使得劳动者与消费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其次，在劳动关系链条延伸和劳动过程技术控制的双重影响下（罗峰，2021），一方面降低了数字劳动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虚拟联系，劳动者可以随时进入或退出多个平台。最后，在这种脆弱的劳资关系下，以内容创作（如视频博主、网络作家等）与生活服务（如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等）为代表的劳动者势必迎合并满足消费者的特定欲望，导致数字产品的庸俗化与类型化。因此，劳动关系的脆弱性必然导致劳动过程的“不确定性”，在劳动技能的低门槛性

和劳动者的商品化现象的加持下，必然会推动劳动者生产出“满足”消费者特定欲望的产品。

4. 平台经济下的数字劳动研究：文献编码与内容框架

数字平台以算法为底层逻辑，在几乎没有人工干预的环境下重塑了传统的劳动过程（Wood et al., 2019），理论界关于数字劳动研究的议题也不断丰富。本部分将基于对数字劳动的概念和特征的分析，对检索到的中英文文献进行编码，在梳理和总结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研究重点的基础上，提炼出多学科视角下数字劳动研究的内容框架图，以期帮学者们更好地理解现阶段数字劳动的研究概况。

首先，在内容编码和分析阶段，本文主要借鉴了刘善仕等（2022）和刘苹等（2023）的操作方法，邀请三名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课题组成员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对文献的基本信息（如文献标题、作者、发文时间）进行了提取，并针对文献的关键内容示例，提炼了文献的内容特征、关注主题等。

其次，为确保编码结果科学性与问题导向，我们进一步邀请了两名专门从事平台经济与数字劳动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文献的编码结果进行了交叉检验与论证。在检验过程中，我们剔除了编码结果始终存在分歧的文献，最终保留了 451 篇文献。进一步，参考刘苹等（2023）的操作方法，由专家对编码结果进行了归纳与整理，例如，内容特征为“劳动关系的变迁如何影响权益保障问题”的中文文献与“数字劳动法、劳资冲突与第三类劳动者法理逻辑的探讨”的英文文献均涉及劳动关系与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因此将这两类文献归纳为同一类型。重复上述过程，本文将研究文献归纳为 6 个类别（见表 1、表 2）。

表 1 中文文献的类别与文献编码（示例）

文献类别	关注主题	内容特征	文献（关键）内容示例	代表文献
第一类	新型劳动关系构建与劳动者权益	劳动关系的变迁如何影响权益保障	①……任务化模糊了用工关系的继任性……推动了去劳动关系化现象 ②我国司法机构应当灵活地理解劳动关系从属性特征……适时引入劳动关系推定规则……将具有经济依赖性的劳务提供者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	班小辉（2019）
第二类	数字劳动造成的社会影响	数字劳动如何影响伦理道德与文化体系	①……然而，这些研究都忽视了数字劳动作为最基本活动与劳动者之间的交互关系…… ②数字劳动异化……进行负面和消极的构建，促使人与社会不断在制度和技术上进行自我批判与纠正	孙伟平和尹帮文（2022）
第三类	企业经营策略与服务绩效	平台经济如何影响企业经营活动与策略以提高服务绩效	①顾客在共享经济平台交易时，信任是影响顾客购买行为的关键因素 ②……建立第三方标记和身份认证制度有助于提升预订量……采用实证方法验证了民宿服务质量对预订量的影响……	徐峰等（2021）

续表				
文献类别	关注主题	内容特征	文献（关键）内容示例	代表文献
第四类	算法控制与组织变革	数字劳动中的算法控制、劳动过程与劳动者依赖	①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具有多重并发因果关系……高目的型组态是生产被动工作意愿的主要原因，高价值型组态是生产主动工作意愿的主要原因 ②……企业通过算法完成的管理创新……提升零工劳动者的工作卷入 ③……减少“算法霸权”，增加信息公平、程序公平、分配公平的算法协商和民主参与程序	王文举等（2022）
第五类	劳动异化、情感剥削与反抗	数字劳动过程中的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以及算法反抗	①在数字资本主义中，这种劳动过程中的管理与控制实现了飞跃……监视资本主义是与数字资本相伴生的概念…… ②这是一种表演出“符合”客户需求的情感……通过反馈机制进行排名和评级，并将其应用于执行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	王蔚（2021）
第六类	数字媒介的作用与平台资本的运营逻辑	平台媒介如何影响社会权力的变化及平台资本的运营逻辑	①数字资本借助传播技术的力量，对传统劳动进行了时空分离与权力内嵌 ②从生产关系视角审视数字劳动……网络传播组合了人们的社交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在该地点上的密切联系 ③媒介技术以何种形式重塑了劳动的时空逻辑？	吴鼎铭（2021）

表 2 外文文献的类别与文献编码（示例）

文献类别	关注主题	内容特征	文献（关键）内容示例	代表文献
第一类	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与“数字劳动”法理逻辑探讨	数字劳动法、劳资冲突与第三类劳动者法理逻辑的探讨	①... labour platform increase the agency of workers to contract with clients... and thus reduce the risk of false self-employment in terms of the worker-client relationship ②... this study was to consider whether conflict in the remote gig economy might be generated and shaped by the specific manner...	Wood 等（2021）
第二类	数字媒介与平台经济如何影响社会生活	数字平台对社会、文化与政策的影响	①this infrastructural turn assumes greater significance in relation to digital media and in particular... ②the influence... have come to wield... Having ‘disrupted’ many sectors... digital platforms now seem to operate as infrastructures themselves	Plantin 和 Punathamkekar（2019）
第三类	平台服务过程中数字劳动者的情绪劳动与情感	数字技术对劳动者情绪的影响以及情绪调节与组织变革	①we found almost no extreme emotional state... this could be attributable to the emotional self-regulation... and corresponding emotional adjustment tactics in the organization ②... for organization, they must acknowledge that traditional model of business service has changed under th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Web 2.0	Liu 等（2022）

续表

文献类别	关注主题	内容特征	文献 (关键) 内容示例	代表文献
第四类	劳动过程与算法控制	算法控制与抵抗对组织管理模式的影响及如何重塑雇主与雇员关系	①... algorithmic technologies in organization prompts questions about how algorithms may reshape organizational control ②... managers implement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to maximize the value... and workers resist... ③ we find that algorithmic control in the workplace operates through six main mechanisms, which we call the “6 Rs”	Kellogg 等 (2020)
第五类	数字劳工与数字剥削	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异化与控制	①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ngoing trend in outsourcing low-skilled work to the crowd... and how platform design features and algorithmic... to assign, monitor and evaluate work ②Its findings highlight the need for transparency in platform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algorithms to ensure that workers are protected from the vulnerabilities they face with digital work	Rani 和 Furrer (2021)
第六类	数字媒介的作用及其产生的权力变动	平台经济的类型、特征对社会的影响, 以及国家如何管理	①digital platforms are not just software-based media... they also solidify markets... ②the decisive concept on the micro level would be efficiency and expedient market performance by means of local control ③but it is clear that state interference or direct control of platforms of this kind is deeply problematic...	Schwarz (2017)

根据文献编码结果, 本文对数字劳动的研究主题进行了进一步提炼 (见表 3)。为避免歧义, 本文参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2011 年) 》, 将本文归纳出的 8 个研究范畴 (劳动法学、社会学、旅游管理、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劳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 聚类为法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这四大学科门类 (详见表 3)。

表 3 数字劳动研究范畴与学科门类

归 纳 依 据	研究主题提炼	研究范畴	学科门类
第一类文献均涉及平台经济中劳动者的劳动雇佣关系形成, 也涉及法律制度如何保障劳动者权益。因此, 将研究范畴归纳为“劳动法学”, 学科门类归纳为“法学”	新型劳动关系与劳动者权益保障、“数字劳动法”法理逻辑的适用性	劳动法学 (5.77%)	法学 (13.46%)
第二类文献均涉及数字劳动与平台经济的出现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因此, 将研究范畴归纳为“社会学”, 学科门类归纳为“法学”	数字劳动对伦理道德、社会权力关系与生产生活的影	社会学 (7.69%)	

续表			
归纳依据	研究主题提炼	研究范畴	学科门类
第四类文献主要以劳动过程的控制为核心探讨数据、算法如何影响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与行为选择。因此，将研究范畴归纳为“劳动经济学”，学科门类归纳为“经济学”	算法控制、劳动过程与劳动者行为	劳动经济学 (15.38%)	经济学 (34.62%)
第五类文献探究技术遮蔽平台剥削的实质及其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与异化问题。因此，将研究范畴归纳为“政治经济学”，学科门类归纳为“经济学”	数字剥削对劳动异化、劳动控制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 (19.23%)	
第六类文献主要探讨平台媒介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如何影响社会的权力体系变动，以及媒介作为资本的运营逻辑问题。因此，将研究范畴归纳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学科门类归纳为“文学”	数字媒介对劳动生产率、劳动形态的影响	传播政治经济学 (26.92%)	文学 (26.92%)
第三类文献既涉及平台经济的出现对服务型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也探讨了组织中劳动者的情绪问题，还探讨了企业经营策略的调整以适应数字化、平台化经营的需求。在研究的对象、结果等方面存在交融性，故将研究范畴归纳为“旅游管理”“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三个范畴，学科门类归纳为“管理学”	算法决策与情绪行为	组织行为学 (11.54%)	管理学 (25.00%)
	运营策略与企业绩效	战略管理 (7.69%)	
	服务体验与服务绩效	旅游管理 (5.77%)	

注：百分比表示相应范畴下的文献数量在 451 篇文献中所占的比例。

基于上述工作，本文在系统性回顾数字劳动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学科门类的划分标准与文献编码结果，提炼出一个关于数字劳动研究的内容框架图（见图 4），以期帮助学者们较为全面地了解现阶段数字劳动的研究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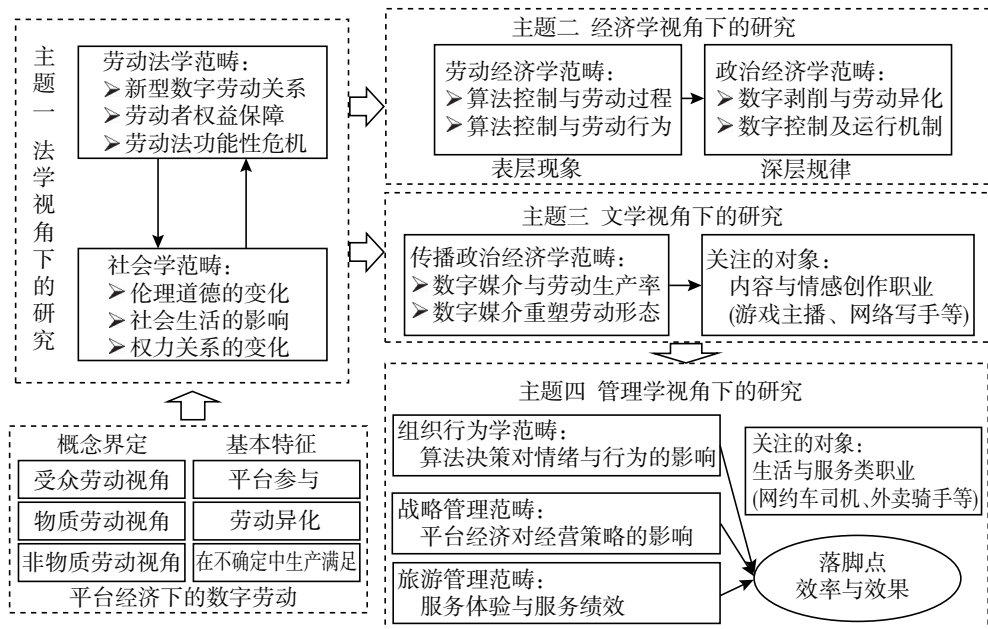


图 4 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研究的内容框架

5. 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研究的多学科文献评述

结合数字劳动研究的内容框架（见图4），本部分从法学、经济学、文学、管理学四个学科门类出发，对数字劳动研究的主题、内容、理论基础与成果等方面进行整理，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5.1 主题一：法学视角下的数字劳动研究

从数字劳动的研究现状和进展来看，其理论研究成果仍然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通过系统性文献梳理，本文发现法学视角下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归纳为劳动法学与社会学两个范畴。

第一，劳动法学范畴下的研究。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围绕“构建新型数字劳动关系以保障劳动者权益”“调整劳动法以解决功能性危机”两条逻辑主线展开。在构建新型数字劳动关系以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议题上，肖竹（2021）基于劳动关系视角，认为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背景下，劳动用工实践已然触动了劳动法产生、发展、适用的原点性问题。有学者指出，尽管互联网平台经济造就了诸多就业岗位，但它也导致了从属性劳动关系与独立性劳动关系之间的灰色地带不断扩大（班小辉，2019）。例如，在外卖行业中，骑手与平台之间通过即时配送服务来实现盈利，这种现象符合“劳务承揽”的概念范畴，但在“经营范畴”的法律界定上数字平台却宣称自己提供的是“信息服务、中介服务”，扮演“信息居间”的角色，传统劳动法开始面临功能性危机（邹开亮和王霞，2020）。

在调整劳动法以应对功能性危机上，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两种解决思路：一是打破劳动关系的传统认定标准。有学者指出，新就业形态实际上存在“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与“零工关系”三类类别，在传统“二元模式”的基础上，可以将劳动者纳入法律的中间地带——通过设置“第三类劳动者”或“非标准劳动关系”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刘苹等，2023）。二是进行特别立法。在实践中，企业经营策略的制定并非从法律角度来改进劳动用工方式，同时数字劳动中灵活化和“多雇主化”现象的存在，使得大量新就业形态群体（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缺乏劳动法的保护。相反，以企业高管为代表的部分高级别劳动者却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劳动法日益演变为“贵族劳动法”（沈建峰，2022）。总之，尽管劳动法学范畴下的研究已经意识到传统劳动法的局限性，但无论进行特别立法还是引进新的认定标准，其目标导向始终在于如何有效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社会学范畴下的研究。通过系统性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还关注数字劳动带来的伦理道德变化、社会权力关系变迁及其对生产生活的影响。首先，在伦理道德的研究中，卞靖懿（2022）基于劳动异化理论，发现大数据时代推动了资本的数字化转型，造成了生产逻辑、大数据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劳动剥削现象更加隐秘。例如，2020年，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这篇文章一方面反映了平台财富的急速增长，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平台算法治理之下劳动者处境的不断恶化。孙萍（2019）的研究结果也证实，数字平台的“算法逻辑”会造成“时间内嵌”“情感劳动规训”等问题，这不可避免地会将劳资矛盾转移到“技术—劳动”的层面，表现出“人的逻辑”和“算法逻辑”的对抗与糅合。其次，除了对伦理道德的影响外，数字平台的出现还会对生产生活与社会权力关系产生影响。罗峰（2021）系统总结了网络时代青年群体数字劳动的逻辑主线，作者指出，随着数字劳动关系链的延伸与劳动控制技术的发展，青年劳动者在不断生产满足消费者特定欲望的产品之时，也间接造成了劳动者技能水平的降低，对社会发展带来潜在的威胁。范如国（2021）基于复杂适应性理论，发现在平台技术“幂律法则”和“增量赋权”效应的影响下，许多平台会逐步演化成为一种公共物品，并对平台技术理性可能会对社会与政治理性产生反噬表达了担忧。总之，社会学范畴下对数字劳动问题的探讨仍然停留在质性分析或演绎推导阶段，分析数字技术的出现对劳动过程、社会权力变革的影响。

5.2 主题二：经济学视角下的数字劳动研究

在经济学视角下，研究范畴集中在劳动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个领域，具体来说：

第一，劳动经济学范畴下的研究。不同于劳动法学，劳动经济学主要以“算法控制”作为切入点，探讨算法控制对劳动过程与劳动者行为的影响。在有关劳动过程的研究中，朱悦衡和王凯军（2021）从数字过劳视角出发，揭示了数字过劳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平台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索取。刘苹等（2023）也发现，数字平台在加速劳动资源高效配置的同时，也表现出“数字泰勒主义”的倾向，通过不断挑战员工的生理极限，间接引发了“效率之恶”。王蔚（2021）则从情感劳动角度，解释了算法规制如何在劳动过程中开发平台劳动者的情感资源，进而迫使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投入情感。可见，算法在重塑传统劳动过程之时，已经从生理与心理两个层面形成了对劳动者的技术围猎（张媛媛，2022），所以在算法规制之下关于劳动者行为选择及应对策略的研究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Kellogg 等（2020）发现，算法会通过 6 种机制重塑传统的组织控制方式，并系统地梳理了劳动者可能采取的逃避、操作算法管理的措施。刘善仕等（2022）则认为劳动者不仅会主动适应算法管理，还会通过寻找算法漏洞和解码算法运行机制来操作算法管理。然而，理论界针对算法管理下劳动者行为策略的研究仍然停留于质性分析或理论探讨的阶段，尚缺乏实证分析。总之，关于平台算法如何影响劳动者的行为策略选择及其背后的效应机制，尚待实证研究进行深入探讨和论证。

第二，政治经济学范畴下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下，学者们主要探讨数字剥削与劳动异化的实质、以劳动控制为核心探讨数字劳动的运行机制两个问题。（1）在数字剥削与劳动异化方面，刘海霞（2020）基于数字劳动异化理论，指出数字资本主义模糊了工作与娱乐的边界，劳动者自身难以意识到自己在进行劳动，劳动剥削程度反而会加剧。陈红和邢佳妮（2023）则从数字劳动的主体、客体、本体和劳动权力关系变迁等方面总结了数字劳动异化的具体表现，并且提出了数字劳动异化带来的三重危害。（2）在劳动控制的研究中，韩文龙和刘璐（2020）借鉴劳动过程理论，发现数字化的生产方式会深刻影响雇佣关系、劳动控制过程以及劳动报酬支付，并且总结了数字劳动过程的四种表现形式。朱悦衡和王凯军（2021）从数字过劳视角，发现劳动关系的松散化、劳动的隶

属转移、数据控制与激励机制是造成数字过劳现象的主要原因, 最终加剧了再生产环节的内卷化与“三重挤出”效应。总之, 政治经济学范畴下的研究主要探讨平台用工模式存在的数字剥削、劳动异化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可见, 如何协调劳资关系与存在的矛盾, 探索适合我国国情与社会制度的数字劳动实践, 成为后续理论研究需要探讨的问题。

5.3 主题三: 文学视角下的数字劳动研究

文学视角下的研究集中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范畴, 主要遵循 Smythe 的“受众商品”假设, 探讨媒介产业劳动者所面临的困境、福利待遇与社会保障变迁等核心议题。从研究的范式来看,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方面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似的研究范式, 主要关注数字媒介如何影响劳动过程与劳动再生产; 另一方面学者们普遍将劳动者视为“受众”, 分析数字媒介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劳动者的影响。具体来说: 一是将数字劳动置于全球语境中, 探讨平台媒介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例如, 姬德强 (2022) 基于国家、市场与社会三方互动框架, 分析了新闻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逻辑差异。Schwarz (2017) 认为, 数字平台作为一种媒介, 它不仅巩固了劳动市场, 还提高了宏观调控的效率。二是强调劳动者是媒介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注媒介产业中劳动者的类型、劳动过程及其对劳动者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例如, 吴鼎铭 (2017) 根据劳动形式的不同, 将“数字劳动”分为内容生产与消费者、弹性雇佣下的网络写手、游戏产业中的廉价“玩工”三种类型。随后, 郭小安和李晗 (2021) 以及刘战伟等 (2021) 分别分析了游戏陪玩与短视频创意劳动者的劳动过程, 发现劳动者不仅被要求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 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去异化”的趋势。总的来说,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游戏陪练、网络主播、网络写手等以内容和情感创作为核心的职业, 多采用田野调研与质性研究对劳动过程中存在的情感劳动现象进行挖掘。

5.4 主题四: 管理学视角下的数字劳动研究

管理学视角下数字劳动的研究以效率和效果为导向, 主要关注平台算法管理对劳动者的情绪与行为方面的影响, 同时也关注算法决策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本文通过系统性文献梳理, 发现研究集中在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与旅游管理三个范畴。具体来说:

第一, 组织行为学范畴下的研究。从现有的研究主题来看, 学者们重点关注算法决策对劳动者的情绪、行为与认知体验等方面的影响。在劳动者情绪与行为的研究中, Kellogg 等 (2020) 强调, 劳动者对算法决策与感知劳动收益之间是否存在公平性的主观评判会直接影响劳动者的情感与认知体验。Newlands (2020) 则发现, 由于劳动者的隐私信息在数字虚拟空间中能够被算法轻易识别, 这可能诱发劳动者的恐惧与消极情绪。刘善仕等 (2022) 则指出, 由于算法决策的程序不一定是透明的, 平台劳动者可能会采取积极或消极的措施来适应、逃避或操作算法。Kellogg 等 (2020) 则将这一类行为归纳为“算法行动主义”。在劳动者认知体验的研究中, 刘小禹和余彩婷 (2023) 以及 Doorn (2017) 指出, 在算法控制之下, 情绪是加剧劳动者自我损耗的重要原因, 并且会使得他们对数字劳动的满意度“大打折扣”。高雪原等 (2023) 借鉴 JD-R 模型, 分析了外卖骑手工作压力的形

成机理，指出算法技术嵌入、权力结构配置与工作特征的变化是造成零工工作者压力的重要情境因素，会间接引发一系列负性情绪体验。总之，组织行为学范畴下的研究聚焦于算法管理对劳动者情绪及其行为策略的影响机制研究，研究多以质性研究为主，尚缺乏实证研究予以验证。

第二，战略管理范畴下的研究。学者主要研究平台经济的发展对企业经营策略与绩效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从积极的角度看，学者们认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劳动力在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有效匹配，通过影响企业传统的人力资源政策，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刘苹等，2023）；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劳动依托数字平台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升级。从消极角度看，Meijerink 等（2019）指出，平台用工模式对于劳动者的选拔与招募远不及传统雇佣模式严谨，这可能导致企业劳动者素质低下、对企业忠诚度与归属感降低，从而加剧企业可能面临的劳务纠纷与法律风险。郑祁等（2019）也认为，随着合作的远程化与劳动者的去技能化现象的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迫使企业不断调整经营战略以适应环境变化。此外，还有学者提到，虽然数字平台能够轻易捕获、分析和利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各种行为数据，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Curchod et al., 2020），但是劳动者对算法“运作黑箱”的担忧和恐惧情绪，可能会诱发“平台脱媒”从而负向影响平台经营绩效（Rosenblat & Stark, 2016）。综上，理论界关于平台经济发展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仍有待完善，大多数学者虽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持有积极态度，但同时也意识到可能会存在消极影响。

第三，旅游管理范畴下的研究。平台通过算法技术输出的服务模式创新实践能够最终作用于服务体验与服务绩效的提升，是旅游管理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尽管理论界尚未有研究直接证明算法技术对二者存在积极作用，但学者们也开始从情绪劳动、信任机制、情感体验等角度出发开展了实证分析。例如，Liu 等（2022）通过对多模态数据集的对比和分析，发现平台客服的情绪劳动是影响服务质量的核心，同时受制于顾客语言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最终决定平台客服的服务模式选择。徐峰等（2021）基于对 Airbnb 的实证研究发现，信任是决定顾客产生购买意愿的关键因素，其中基于情感的信任机制会对民宿的预订量产生正向影响。此外，黄和平等（2022）基于上海迪士尼度假村的研究发现，房东所提供的额外服务，如助游服务、午餐晚餐服务等，有利于提升消费者的情感体验。

总之，管理学视角下的研究多集中在外卖骑手、民宿从业者、平台客服等服务型职业，三个范畴的数字劳动研究已经呈现出彼此渗透、相互交融的趋势。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与启示

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数字劳动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兴的管理实践和理论创新，近年来已经受到了多个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系统性文献回顾法，从多学科视角梳理了数字劳动研究的内容，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法学视角下的研究以维持数字劳动关系与社会稳定为出发点，重点探讨如何调整和扩大

劳动法的适用范围以应对其所面临的功能性危机,同时也关注数字劳动对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型劳动关系,而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对新型劳动关系的认定尚不清晰,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现实性问题。因此,一是从政府层面加快完善和落实数字劳动法,明确劳动关系、规范平台行为,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二是创新监督与治理理念,政府部门可以加强对算法内容与底层逻辑的合理性审查,有效治理由平台算法治理所引发的“劳动异化”与“情感规训”等问题。

第二,经济学视角下的研究以探讨数字劳动的运行机制为出发点,既关注平台算法对劳动过程与劳动者行为的影响,又探讨造成这种影响的背后机制。数字平台通过算法提高了劳动资源在市场上的匹配效率,但是在算法决策的非人性化和效率导向之下(刘善仕等,2022),劳动者实际上长期处于“情感剥削”“三重脱嵌”之中。同时,算法决策还表现出刻意迎合消费者的倾向,成为数字平台规范劳动过程、劳动方式、劳动标准的重要工具,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从劳动者的产出中攫取经济价值。因此,对于数字平台而言,一是应该积极主动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要树立算法伦理道德意识,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理权益;二是要杜绝“最强算法”考核理念,主动优化算法决策及其机制,防止因过度劳动异化带来的“效率之恶”。

第三,文学视角下的研究主要将劳动者视为“受众”,旨在揭示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对劳动者、劳动过程与劳动关系等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劳动者的“创造性能力”逐渐演化为“操作性能力”,通过降低数字劳动的准入门槛,加速了劳动者的去技能化。另一方面,各种数字符号成为衡量劳动产出的重要指标,劳动产出逐渐表现出以满足消费者的特定需求和欲望为导向,间接推动了劳动产出的庸俗化和类型化。因此,对于劳动者而言,一是努力提高技能水平,降低自身的被替代风险;二是努力提高工作素养与坚守职业道德,主动生产和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降低产品的类型化与庸俗化。

第四,管理学视角下的研究旨在揭示平台经济发展对企业经营战略以及劳动者行为的影响。数字平台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大程度降低了企业的人才招聘成本;同时,企业无需在传统“二元制”雇佣关系下向劳动者提供福利保障,节约了管理成本,但是这也间接导致了企业人力资本外溢化。因此,企业一是要积极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不断应对环境变化;二是调整人才招聘策略,在招聘环节主动向劳动者提供基本福利保障措施,提高企业的亲和性。

6.2 理论反思与研究展望

数字劳动作为平台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管理实践,通过整合“技术逻辑、数字逻辑、制度逻辑”(陈红和邢佳妮,2023),已经成为劳动用工的新趋势和理论研究的新焦点。这种技术协同、跨界融通的新型劳动用工模式,对于实现劳动资源的有效匹配,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至关重要。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管理学的相关文献数量低于经济学和文学两个学科门类(见表3),其理论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与此同时,随着2019年《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与2021年《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官方文件的陆续出台,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of Digital Labor under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 diagram illustrates a research framework centered on "Platform Economy under Digital Labor Research". It is influenced by "Law: Social Technical Paradigm and Social Moral Change..." at the top and "Economics: Algorithm Control and Labor Behavior..." on the right. The framework includes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examples like emerging occupations, gaming, and travel services) and "Inductive Deduction" (with a cycle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Economics). The central research object is "Digital Labor", which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Digital Labor" (emotional and affective labor) and "Laborer Behavior" (algorithm control, digital platform, and digital laborer). The framework also includes "Research Viewpoint" and "Research Object". At the bottom, it shows "Policy Guidance" and "Paradigm Reference" leading to "Management Science: Academic Reference, Paradigm Reference...". The diagram is framed by "Digital Occupation" and "Labor Emotion" on the left,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Algorithm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n the right.

图5 基于多学科视角的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的研究展望

(1) 进一步完善数字劳动及其相关概念的研究, 强化理论对实践的指导。现阶段, 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应用层面, 数字劳动的概念和内涵正处于不断完善和快速成长的阶段,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数字劳动及其相关概念的研究。纵观与数字劳动主题相关的各类研究, 学者们大多采用归纳演绎、定性描述、个案对比分析等方法对数字劳动的基本属性、应用范畴等进行了初步描述和界定, 这一方面可能与数字劳动本身的复杂性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催生的各类新型数字职业有关。然而, 基本概念研究的科学性与系统性缺失必然会导致理论研究陷入“管理丛林”, 这不仅会降低管理理论的科学性, 还会降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因此,对未来的研究而言,一方面,在结合数字劳动传统概念解读的基础之上,还应该考虑平台经济对传统劳动过程的重塑作用,丰富和完善数字劳动的内涵与核心维度;进一步,可以开发针对数字劳动内涵、构念的测度量表,为该领域的实证研究提供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未来的研究

还需要注重与数字劳动相关概念的语义区分与辨析。例如, 随着网络主播、游戏陪玩等新兴数字职业的兴起, 情感劳动 (affective labour) 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话题。不同于 Hochschild 所提出的情绪劳动 (emotional labour) 的概念, 情感劳动 (affective labour) 源自 Hardt 和 Negri 的同名著作《情感劳动》, 用来描述劳动者表现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愿的情绪状态。然而, 受制于翻译语境的影响, 48.2% 的 CNKI 期刊论文存在概念误用现象, 仅有 22 篇 (占比约为 19.3%) 的文献正确使用了“情感劳动”这一概念 (郭小安和李晗, 2021), 其理论概念“张冠李戴”的现象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 数字劳动研究还需要加强理论审视与概念研究, 确保理论研究成果的正确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2) 从研究的框架来看, 注重多学科范式交融与多方利益诉求问题的研究。平台经济下的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事物, 其本身表现出劳动关系的复杂化、参与主体的多样化、社会影响的广泛化等特征。在实践中, 一方面互联网与平台媒介的普及正在悄无声息地重塑阶层关系, 部分意见领袖和网络大 V 表现出强大的舆论与社会影响力; 另一方面劳动者在经济、文化、收入水平等方面的不平等也势必加剧了“马太效应”, 这会间接影响教育培训、旅游服务、社会保障等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 影响范围与深度日益加大。

因此, 对于未来的研究, 一是可以参考和借鉴“政治—经济—文化”研究框架 (姚建华和徐偲骥, 2019), 阐释数字平台如何通过算法决策在劳动群体中营造“制造同意”, 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中国文化环境, 关注数字劳动者的情感体验; 二是可以将研究的范围拓展到数字劳动的生产场所之外, 将生产与“再生产”环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 例如, 可以关注数字劳动如何影响青年人口的就业、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工作—家庭关系等; 三是还可以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解读劳动者及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利益交互问题。在数字劳动中, 由于平台的经济收益与劳动者的服务质量密切相关, 平台通过算法实现了劳动信息的加密处理, 通过对劳动关系链的延伸和劳动过程“不确定性”暗示 (张媛媛, 2022; Rosenblat & Stark, 2016), 达到了劳动控制的效果。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分析信息不对称如何对劳动者及其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产生影响。

(3)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 关注算法管理下劳动者行为问题研究。当前, 平台算法实际上已经摆脱了单一技术架构的范畴, 通过对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劳动关系三方面的解构, 实现了劳动过程的数字支配 (张媛媛, 2022)。一方面, 平台算法通过构建三方评价机制, 将“五星好评”纳入劳动者绩效考核体系, 加剧了劳动者的工作压力和内卷; 另一方面, 算法通过“游戏化”的工作设计还间接导致了数字过劳现象, 劳动者面临平台的“技术围猎”和“算法霸权”, 往往会通过各种逆算法实践寻找算法漏洞和解码算法运行机制, 使得算法更有利于增加自身利益 (如网约车司机通过与顾客合作实现了“空单运转”“下空单”; 外卖骑手通过“挂单”和“报备”方式延长配送时间等)。值得注意的是, 这类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个体的理性行为, 但它们可能并非合理合规, 如果不加以规制容易在劳动者中不断扩散、蔓延, 最终演化成为一种集体性的不理性行为, 导致平台算法运行机制处于部分或完全失灵状态。

因此, 对于未来的研究而言, 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关注算法控制之下劳动者表现出的各类行为, 如创新行为、重塑行为、偏差行为、逆算法行为等, 探讨产生这类行为的前置因素及其机制; 另一方面还可以借鉴羊群效应、随机过程等理论, 对这类行为的形成与演化机制进行仿真分析, 从而科

学解释劳动者的各类逆算法实践将如何影响或重塑平台的算法运行机制。

(4) 从研究的对象与方法来看,重视新兴数字职业与实证研究。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各种新兴的数字职业也在不断涌现,以游戏行业为例,根据工作性质与目标的不同,可以将游戏陪玩细分为游戏代练、游戏陪练等。一方面,这种新兴职业来得“既急又快”;另一方面,它们又不同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被动接受平台算法规制,以投入情绪劳动为核心特征的职业。在劳动过程中,这类职业面临平台算法控制反而呈现出强烈的自我进取、自我商品化的倾向。劳动者根据客户需求的不同往往主动地提供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情感服务,情感的制造与传递反而成为这类劳动者工作的核心。

因此,未来研究一方面可以将研究的对象从以生活类众包服务为代表的职业(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转移到以内容创作为代表的职业(如游戏陪玩、网络主播、网络写手),结合不同类型数字职业的劳动过程、劳动控制、情感体验、工作投入、情感承诺等问题设计相应的测度量表,为理论研究提供科学的工具;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用演化博弈理论、ISM 等系统动力研究工具,推动量化研究工作的开展,提高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丰富理论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 [1] 班小辉.“零工经济”下任务化用工的劳动法规制[J].法学评论,2019,37(3).
- [2] 卞靖懿.大数据时代数字劳动正义觉解[J].道德与文明,2022(4).
- [3] 陈红,邢佳妮.数字劳动异化的表征、危害及其超越[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1(2).
- [4] 丁依然.从“剥削”中突围:数字劳工研究的现状、问题和再陌生化[J].新闻界,2021(5).
- [5] 范如国.平台技术赋能、公共博弈与复杂适应性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2021(12).
- [6] 高雪原,张志朋,钱智超,等.零工工作者工作压力:形成机理与量表开发[J].南开管理评论,2023,26(3).
- [7] 郭小安,李哈.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概念的误用、辨析及交叉性解释[J].新闻界,2021(21).
- [8] 韩文龙,刘璐.数字劳动过程及其四种表现形式[J].财经科学,2020(1).
- [9] 黄和平,卢毅琮,姜红,等.基于特征价格模型的景区依附型民宿定价机制研究——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2,41(2).
- [10] 姬德强.数字新闻业的政治经济学:基于比较体制与数字经济的视角[J].新闻界,2022(4).
- [11] 刘海霞.数字劳动异化——对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阐释[J].理论月刊,2020(12).
- [12] 刘苹,熊子悦,张一,等.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研究:多学科多视角的文献评述[J].西部论坛,2023,33(1).
- [13] 刘善仕,裴嘉良,葛淳棉,等.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理论探索与研究展望[J].管理世界,2022,38(2).
- [14] 刘小禹,余彩婷.悲欣交集:数字技术与员工情绪[J/OL].外国经济与管理, <https://>

doi.org/10.16538/j.cnki.fem.20230501.102.

- [15] 刘战伟, 李媛媛, 刘蒙之. 平台化、数字灵工与短视频创意劳动者: 一项劳动控制研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1, 28.
- [16] 罗峰. 在不确定中生产满足——网络时代下中国青年数字劳动研究述评 (2010—2020)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 (4).
- [17] 沈建峰. 数字时代劳动法的危机与用工关系法律调整的方法革新 [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2, 28.
- [18] 孙苹. “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 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 [J]. 思想战线, 2019, 45.
- [19] 孙伟平, 尹帮文. 论数字劳动及其与劳动者的双向建构 [J].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6).
- [20] 王蔚. 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及其情绪剥削 [J]. 经济学家, 2021 (2).
- [21] 王文举, 魏巍, 刘贝妮. 乐在其中还是权宜之计? ——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研究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2, 43 (10).
- [22] 吴鼎铭, 胡骞. 数字劳动的时间规训: 论互联网平台的资本运作逻辑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1).
- [23] 吴鼎铭. 网络“受众”的劳工化: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网络“受众”的产业地位研究 [J]. 国际新闻界, 2017, 39 (6).
- [24] 肖竹. 劳动关系从属性认定标准的理论解释与体系构成 [J]. 法学, 2021 (2).
- [25] 徐峰, 张新, 梁乙凯, 等. 信任构建机制对共享民宿预订量的影响——基于 Airbnb 的实证研究 [J]. 旅游学刊, 2021, 36 (12).
- [26] 徐婷婷. 劳动异化与劳动同意: 互联网数字劳动的价值二重性辨析 [J]. 新闻爱好者, 2021 (4).
- [27] 姚建华, 徐偲骞. 全球数字劳工研究与中国语境: 批判性的述评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 48 (5).
- [28] 张成刚, 张中然. 新就业形态的就业留存——基于外卖骑手的定性比较分析 [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2, 36 (5).
- [29] 张媛媛. 算法之眼与数据蔽视: 媒介空间中的劳动管理研究 [J]. 传媒观察, 2022 (1).
- [30] 郑祁, 杨伟国. 零工经济前沿研究述评 [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9, 36 (5).
- [31] 朱悦衡, 王凯军. 数字劳工过度劳动的逻辑生成与治理机制 [J]. 社会科学, 2021 (7).
- [32] 庄曦, 董珊. 情感劳动中的共识制造与劳动剥削——基于微博明星粉丝数据组的分析 [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9, 56.
- [33] 邹开亮, 王霞. 算法控制下外卖骑手劳动关系的去离、回归与协调 [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43 (5).
- [34] Curchod, C., Patriotta, G., Cohen, L., et al. Working for an algorithm: Power asymmetries and agency in online work setting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20, 65 (3).
- [35] Danese, P., Valeria, M., Romano, P.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n recent lean research: State-of-

- the-art and future direc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7, 20 (2).
- [36] Doorn, N. V. Platform labor: On the gendered and racialized exploitation of low-income service work in the ‘on-demand’ economy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17, 20 (6).
- [37] Fuchs, C. Digital labor and imperialism [J]. *Monthly Review*, 2016, 67 (8).
- [38] Kellogg, K. C., Valentine, M. A., Christin, A. Algorithms at work: The new contested terrain of control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20, 14 (1).
- [39] Liu, P., Zhang, Y., Xiong, Z., et al. Judging the emotional states of customer service staff in the workplace: A multimodal dataset analysis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13.
- [40] Meijerink, J., and Keegan, A. Conceptualiz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gig economy toward a platform ecosystem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2019, 34 (4).
- [41] Newlands, G. Algorithmic surveillance in the gig economy: The organisation of work through Lefebvrian conceived space [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20; 10.177/017084062093790.
- [42] Plantin, J., and Punathambekar, A. Digital media infrastructures: Pipes, platforms, and politics [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9, 41 (2).
- [43] Rani, U., Furrer, M.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and new forms of flexible work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lgorithmic management of work and workers [J]. *Competition & Change*, 2021, 25 (2).
- [44] Rosenblat, A., Stark, L. Algorithmic labor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 case study of Uber’s drive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6, 10 (27).
- [45] Schwarz, J. A. Platform logic: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platform-based economy [J]. *Policy & Internet*, 2017, 9.
- [46] Smythe, D. W.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J].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977 (3).
- [47] Terranova, T.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J]. *Social Text*, 2000, 18 (2).
- [48] Wood, A. J., Graham, M., Lehdonvirta, V., et al. Good gig, bad gig: Autonomy and algorithmic control in the global gig economy [J].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019, 33 (1).
- [49] Wood, J., Lehdonvirta, V. Antagonism beyond employment: How the ‘subordinated agency’ of labour platforms generates conflict in the remote gig economy [J]. *Socio-Economic Review*, 2021, 19 (4).

Digital Labour in Platform Economics: A Multidisciplinary-perspective

Review Based on SLR

Liu Ping Zhang Yi

(Business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Digital labour is a new industrial form brought about by the platform economics, which bring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workers. In this article, we clarify the definition of the digital labour, and the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SLR) is used to review and analyze 595 articles

from Chinese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WOS) .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isting research scope covers eight field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strategic management, tourism management, political economy, labour economics,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abour law and sociology. Then, we extract the basic content framework of the digital labour in platform economics, and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uch as current situation, contents and research focus of digital labour. Finally, in response to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utlook on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digital labour in platform economics. The conclusion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clarify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promoting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digital labour of platform economics in China.

Key words: Platform economics; Digital platform; Multidisciplinary; Structural literature review; Digital labour

专业主编: 杜旌